



“史前贵阳”：助力推动“贵州”成为“贵州史”

从地质学的角度，脚下的这块黔中大地当以“亿”年为时间单位。从元古代的“武陵旋回”到新生代的“喜马拉雅旋回”，上古贵州以陆地的形态露出，共经历了21次地壳运动；垂直方向共18次，时升时降，称为“造陆运动”；水平方向3次，时拉时挤，叫做“造山运动”。

具体到贵阳大地，《山海沧桑》一书从记录地球历史的“书页”——地层岩石入手：贵阳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距今约8亿年前。在约8亿年的地质历史长河中，贵阳共经历了6次海陆变迁，岩石详细地记录了山海转换信息以及古生物的生存演化密码。一组组数据还原了贵阳版的“沧海桑田”：8亿年前的贵阳，不仅是一片大海，而且火山爆发频繁。数亿年前，贵阳有海洋，也有成群的鱼虾、珊瑚、海百合等古生物，还有阳光沙滩、高大茂盛的古植物；距今约2亿年时，整个贵阳抬升成陆地，贵阳从此就告别了海洋。

距今约3750万年前，贵州高原的面貌基本形成。其中，“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广大，黔地因而有“喀斯特王国”之称。自然地貌与文明特质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正如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言：“原始人的文化常常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在文明的民族中，文化的基础已几经迁移，但无论怎样，其文化却依然保留着部分自然的根基。”所以平原与农耕文明、海洋与工业文明有着天然的孪生关系。贵州贵阳地处“山国”，“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其文明的孕育、演化与发展，必然带有鲜明的山地文明特质。

贵州喀斯特地貌高度发育的结果，便是“跬步皆山，无山不洞”。天然的洞穴，为穴居年代的古人提供了栖身之所。在考古学家眼里，“无山不洞”的贵州有着极为丰富的史前文明，贵阳也不例外。迄今为止，贵州已发现的史前洞穴遗址有500余处，其中能确认属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或地点约100处。贵州先民走出洞穴后，在临河、临江的阶地上、旷野里，也都发现了新时期时代的遗址。简言之：约600万年前，人猿站立起来，迈步行走；150万年前，真正的直立人在贵州大地上行走，约4万多年前，贵阳贵安出现了远古人类的足迹。

《考古黔中》一书，开篇即还原了考古工作者破解贵阳贵安招果洞遗址这部四万年“地书”的场景：按照考古工作规程，考古队员们将招果洞遗址的堆积层从上到下进行编号，一直编到了第25

层。这层层叠叠的地层，从远处看，像极了历史的“书页”，那些地层中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就好比是“书页”中的“文字”，那是只有考古人才能识读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了在那个洪荒的年代里，一群又一群人来到这里，又离开这里，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记录了他们一次次带着猎物满载而归，围火而坐，琢石成器，磨骨成锥。随着最后一批洞穴居民的搬离，这里终于沉寂了下来，汇总成了厚达8米、记载了4万多年人类历史的招果“地书”。

就这样，贵阳贵安的先民们点起火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启了史前文明、山地文明的征程。但在远古人类走出山林洞穴、走向河谷平原的“农耕文明”途中，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级区域，不沿大海、不沿长江、不沿边疆，使得黔地在传统农耕文明时代位置不显。“山国”贵州渐渐沦为“三野之地”：“一野”乃“朝野”之“野”，黔中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乃“文野”之“野”，黔中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之“野”，黔中远离帝国经济中心。具体表现在历史文献上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上，明清以前尤其如此。

纸上没有的历史，有可能在土里。从20世纪50年代起，贵州考古工作者就已经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将贵阳贵安的历史上溯至汉晋时期。尤其是2012年以来，贵州考古工作者在贵阳贵安开启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并取得重要发现。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招果洞遗址、大松山墓地分别入选2016年度、2020年度和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十年磨一剑，贵州考古工作者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拉通了贵阳贵安距今4万年以来的人类活动历史，使贵阳贵安成为全省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文化序列连续的唯一地区。通过对遗址历史信息的全方位提取，对一件件出土的骨角器、陶器、瓷器、金銀器深入分析，贵阳贵安4万年以来清晰的历史脉络和鲜活的历史场景逐渐呈现于世人面前，通过实物遗存构建起来的文物历史极大地延伸了贵阳贵安的历史轴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跨越1400余年，首次完整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被誉为一个埋藏在地下的黔中千年史书。

地质学和考古学视野里的史前贵阳贵安，为推动“贵州”成为“贵州史”，提供了角度和助力。

“省会贵阳”：支撑“荷叶形”贵州的一根立柱

西入云南、南下两广、东出华中、北上蜀中，贵州自古为战略要地。战国楚项襄王派庄躄经云贵夹击强秦，秦代修建五尺道，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唐宋设置羁縻州，无不看重黔地军事、地缘价值。

贵州建省，“虽迟但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相邻的“边角”，如拼图般整合而成贵州。省域主要包括东面的新开八府、西面的贵州宣慰司及安顺等三个州，驿道一线相通，状如一个“哑铃”；清雍正年间，今遵义市原属四川，黔南州荔波、罗甸，黔西南州册亨、贞丰、望谟诸县原属广西，都在雍正年间“割黔疆”，方全今贵州之省域。此时的贵州地图，状如一片“荷叶”。

贵州建省以来，贵阳即为省会所在。贵阳地处黔中腹地，倘若于此地立一根支柱，便可将“荷叶形”的全省撑起来。“先有贵州城，后有贵州省。”宋代，宋太祖赵匡胤赐名“贵州”，贵州专指贵阳一地。元代“改贵州为顺元”，建“顺元城”，贵阳的城市雏形自此初现。贵州建省，贵州省名因“贵州”得名。将省会原来的名称作为省名，贵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是仅有的一例。

起初，贵阳的意义偏重于军事。历史上，贵阳

立，则黔省可为、西南可图。明清播州之乱、奢安之乱、咸同之乱震动西南，皆以贵阳城不失而得以平定。贵阳的军事地缘价值，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有点睛之语：“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历朝以贵阳为中心，开拓五条主干驿道：一条由贵阳到云南；一条由贵阳到湖广；一条由贵阳到重庆；一条由贵阳经都匀到云南；一条由四川叙水经贵州毕节到云南。

《贵阳史话》一书，也从地理“通道”的角度，解读贵阳之于贵州乃至全国的意义：贵阳居于云贵高原的盆地中央，有“滇黔的锁钥，蜀粤的屏障”之称。明代，驿道畅通为开发贵阳提供了重要条件，奢香夫人开辟龙场九驿，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明代的贵阳，已成为全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具体表现在：明代的贵阳城已成为“万家之邑”，人口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两次建城基本确立了贵阳城的格局，老贵阳流传的“九门四阁”也是在此时形成了历史记忆；明清实施“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让贵阳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清代完成的改土归流，贵阳作为东进西出、沟通南北的“万马归槽之地”，逐渐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军事要地。

（下转 A5 版）

爽爽贵阳文化「筑」城

（上）

贵阳时空维度里的「万」「千」「百」「十」

编者按

爽爽贵阳，文化筑城。贵阳市启动编撰的《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在贵阳贵安“万”“千”“百”“十”的时空维度里，深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群众文化“五个文化”，推介“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爽爽贵阳”。

12月23日，《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分享会在筑举行。作为贵阳市重大出版工程，《丛书》是“悦”见贵阳、触摸文脉，涵养“爽爽贵阳”城市形象的一部大书。首批出版《山海沧桑》《考古黔中》《贵阳史话》《甲秀昌明》四书，省内外知名作家学者在分享会上逐一解读推介，共同宣传文化贵阳贵安建设成就，讲好贵阳贵安文化故事。本报今日特推出三个专版，以飨读者。

贵阳的建制沿革外延和历史文化内涵，蕴含在“万”“千”“百”“十”间：约在四万年前，贵阳贵安有了最早的远古人类活动足迹，先民们在招果洞建造“洞穴家园”，打磨的石器被考古学界誉为解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贵阳的建制沿革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春秋属牂牁国、战国属夜郎国，自此逐步融入汉文化版图；贵阳建城，有史可查始于元代，迄今七百余年；六百年前，水东土司女杰刘淑贞“卷毯走马四千里”觐见朱元璋，化解西南边陲战乱危机。水西土司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以此推动民族文化融合；五百年前王阳明“龙场悟道”，阳明心学成就了思想史的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近百年来，黔中英才“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为贵阳留下红色文化基因；八十多年前的一九四一年，贵阳撤县设市，自此乃有贵阳市；六十年前“好人好马上三线”，幸福了我们当下的生活……

